



一个谜的揭示——儒学对于中国古代宗教理性化的作用和意义（一）

(2005-6-29 16:14:57)

作者：邹昌林

二

儒学之所以不是狭义的宗教，然而又有宗教一样的社会功能，并且是头脑与心灵、哲学与宗教的统一，原因就在于它是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全面继承者。这种统一性就蕴涵在古礼之中，而不是儒学后天形成的。

诚如笔者早已指出的，中国是唯一从世界第一代文明延续下来的原生道路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整体属于礼文化模式，礼在中国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独特概念，与今天所说的广义文化概念完全一致。1正是因此，中国古代并没有独立的宗教概念，而只有统一的“礼”的概念。西方所说的那种宗教——即狭义的宗教在古礼中只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因而古礼不能视为狭义的宗教。既然如此，则作为其主要继承者的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学也不能视为宗教，因为正是中国古代的礼仪文化传统制约着儒学的发展方式和基本范畴。

然而，儒学不能视为狭义的宗教，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古礼经过儒学的阐发，彻底清除了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而只保留了其终极关怀的义涵，这正是中国大多数学者否定儒学为宗教的根源。但是，由于儒学中还保留有宗教终极关怀的义涵，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社会功能，这又是西方学者，包括部分中国学者把它视为宗教的真正原因。至于这一理性化的过程具体是怎样实现的，这却是至今无人真正揭示的一个难点。

中国古代宗教之所以最后走向理性化的发展轨道，关键就在于它从属于礼，在于它的原生性质。世界其他古代宗教或文化没有沿着这样道路前进，归根，也在于割断了与这种原生性的联系。

我们知道，中国的礼文化作为一个没有中断发展的连续过程，尽管也可以划为古礼与新礼两大阶段（参见拙著《中国礼文化》），新礼阶段的礼，不再象古礼阶段的礼那样，完全源于直接的生产和生活、因时、因地、因事而设，而是先有义理，再根据义理的需要而重新规划和制作的，即古人所说的“义起”方式。但是，由于这种义起方式中的义理，都是从古礼中提炼出来的，在本质内涵上与古礼是连贯一致的，而且，新礼制作时的礼仪环节，也基本是从古礼中因袭过来，加以损益而形成的，所以，它从整体上仍属于原生道路的系统，新礼和古礼，不过是同一文化统一体的连续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义与原生礼仪的特殊结合方式，这正是中国礼文化沿着理性化方向发展的内在原因。中国古代的宗教既从属于礼文化，则随着古礼向新礼的过渡，也有一个理性化的整体趋向。

但是，世界其他主要宗教文化不同，它们的前身，虽也有一个如同中国那样的原生礼文化阶段，而且，其价值内涵也不能说完全与前一阶段没有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早就被扰乱得面目全非了。故当这种文化通过义起的方式进入新的阶段时，已经不再属于原生的文化系统了。它们不但作为起点的义理系统，完全是创教者颁布的神意，而且，为着实现这种神意而设置的礼仪环节，也是创教者主观设计的。故这种礼仪，离开了创教者的神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而它们也就不能沿着原生礼仪文化系统的理性化方向发展。

中国古代原生的礼文化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完全一致性，必然把它导向理性化的道路。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虽然在远古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无不笼罩着万物有灵论或更早的神秘力量的观念，但由于人们的礼仪文化与物质生活取完全一致的方向，那么，这种致用的目的，必然是排挤这种宗教目的源泉。人们的物质致用程度越高，越丰富多彩，就越容易排挤这背后的宗教注意力。何况原始时代的信仰，大多与人们的蒙昧无知联系在一起。故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往由于无知而导致的宗教观念，就会逐渐淡化、消失，而最终赋予它理性的意义。比如，中国古代蜡祭中的八蜡之神，就是如此。这些原始时代具有神性的事物，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都淡化或失去了神性，剩下的只是它们对于人类和农事的功劳，人们祭祀它们，不过是感恩，报答它们。这种观念，基本成了理性化的伦理了。其二，则是古人把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中国古代的礼仪系统能够作为信息库得到完整保存。在礼的设置上，他们并不采用消灭旧礼，完全用新的礼来取代旧礼的形式，而是在保留旧礼形式的基础上，采取添加的方式来完善它。于是，在礼仪中，就出现了历史的层次感。比如，向神献酒的方式，据《礼记·礼运》的记载是：“玄酒在室，醴盞在户，粢醢在堂，澄酒在下。”这里所谓玄酒，实际就是水。所谓醴盞、粢醢、澄

酒，都是为敬神而专门酿制的酒，并依其酿制时间由短到长，酒味由恬淡到醇美依次往下排，最醇美的酒，只能放在最卑的位置上。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实际上，这正是反映了这项礼由设立到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明该礼设立时，农业尚未发明，连粮食都没有，当然也就不会酿酒，故只好用水敬神。以后随着农业的发明，酿酒就出现了，于是，为了把最好的饮料敬神，就把酒也列上了。但是，把酒列上之后，并没有取消前人用水祭神的设置，而是把水放在最尊的位置上，并加尊号为玄酒。酿酒也会随着生产和技术的进步，而逐渐醇美，于是越醇美的酒，就越是后添上去的。不但向神献酒是如此，向神祭献食物也是如此，据《礼器》的记载是“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即越是最尊贵、最隆重的礼仪项目，越是祭献血腥之食，其次是献半生不熟之食，最后才是献熟食。反映这种礼仪设置时，人们尚不知用火熟食，只好以血腥之物祭神。以后随着用火技术的发明，就开始拿熟食祭神了。人们熟食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献熟食也有一个由半生不熟到完全熟食的过程。这种反映历史序列的安排，在古礼中比比皆是。人们正是从这种原生礼仪的设置中，看到了历史的发展进程，所以《礼运》中讲：“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臺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这其中虽没有消灭宗教观念，但对于这种历史进程的理解，则完全是理性化的。这就说明，中国这种原生的礼仪文化，本身的发展，就有一个逐渐排斥蒙昧无知，由万物有灵论等神秘感逐渐走向理性化的趋向。

但是，必须指出，以上所说的理性化过程，在古礼阶段，还只是一种渐进趋势。只有到春秋战国，中国的礼文化和世界其他主要文化一样，才有一个发生社会大变革，整体走向伦理化的突变阶段。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其他主要文化最终都走向了宗教，独有中国文化，一直沿着理性化的道路发展。这到底是何缘故？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中国的礼文化之所以从古礼阶段向新礼阶段的过渡，以及以后的发展进程，没有象其他文化那样走向宗教化，除了这种原生性没有中断外，关键是它受着这种礼仪系统的严格表意功能的制约。中国的古礼系统，实际是渗透到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全方位系统。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正是这种礼仪极为繁复，笼罩着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证据。这种无所不在的特点，使它成了古代文化中最严格的表意系统。这个系统在文字形成之前，已有久远的历史，一直是人类传承文化的主要工具。并且由于这种传承，而最早使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只是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其他文化这种表意系统中断了，而中国却保存了下来，从而二者走上了不同道路。在中国，由于这种礼仪系统无所不在的表意功能的存在，所以，文字的出现并没有消灭这种表意功能，反而成了记载、保存和发展礼仪系统的手段。正是因此，中国古代的礼仪系统，不但进入文明阶段没有中断，而且进入三代国家阶段后，仍继续向前发展，并终于在西周基本定型下来，成为中国文化的整体模式。但是，自进入春秋时代以后，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地区一样，都进入了一个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期，这就是被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时期。所谓轴心时代，从考古上讲，其实就是铁器时代。是铁器提供的巨大生产力的推动，导致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变革，各主要文化都向全面伦理化方向发展。在这进程中，由于其他文明中心的相互影响，被扰乱或中断了与前轴心时代的联系，而改变了发展方向，只有中国仍沿着固有方向前进。这正是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化走上这一变革的道路，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维新的方式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只能走维新的道路呢？原因就在于中国礼仪系统的严格表意功能使然。在继承这种传统的先哲们，特别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看来，中国的伦理精神——即“道”或“道统”，都是包含在礼仪系统中的，是先王和圣人们通过制礼作乐，把它推向全社会的。正是因此，孔子才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离开了礼，就离开了圣人之道。故严格按照礼仪规范去做，就是君子之行。在严格遵守礼仪规范的同时，又能阐发其中的义理，使之不因时代的变化而使圣人之道失传，这就是传圣之道。作为守礼君子，既明圣人制作之义，又能身体力行，那么，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就是成圣之道，这就是内圣。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来说，则能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外王。但是，不管是传圣之道，还是成圣之道，也不管是内圣，还是外王，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点不能变，这就是对礼仪系统的形式及其内在价值的准确把握。然而，却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生了真正的危机，作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严格表意系统，随着春秋战国天子失官，诸侯僭越，陪臣执国命，而乱了套。诸侯僭用天子之礼，大夫僭用诸侯之礼，家臣也僭用大夫之礼，宗族内部相互倾轧，適庶亲疏之礼失序。所以《礼记·郊特牲》讲：“故天子微，诸侯僭，大夫强，诸侯脅。于此相贵以等，相黷以货，相赂以利，而天下之礼乱矣。”这就是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故为了重新恢复社会秩序，就必须重新回到礼的规范中来。然而，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礼崩乐坏”，原来的礼仪系统已经被扰乱，很难复原。

